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论语歧解辑录

上

高尚榘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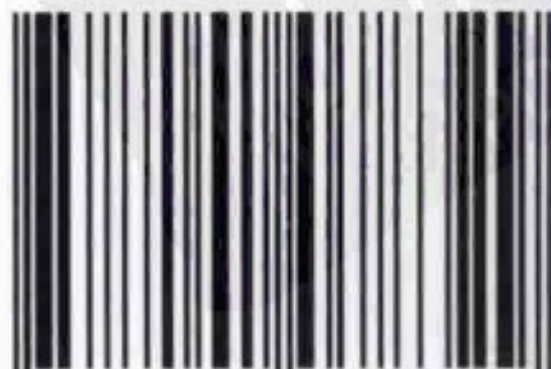


论语歧解辑录

自汉代至今，《论语》研究可谓名家辈出、精彩纷呈，原典疏证和经典解读类著作不断涌现。为使读者能够更加充分利用这些已有材料来理解《论语》之“微言大义”、解读孔子之思想，本书专事汇辑历代歧解材料，举证各家之说，比较互参，对我们研读《论语》很有帮助。

鄧平知著

ISBN 978-7-101-07832-9



9 787101 078329 >

定价：140.00元（全二册）

论语歧解辑录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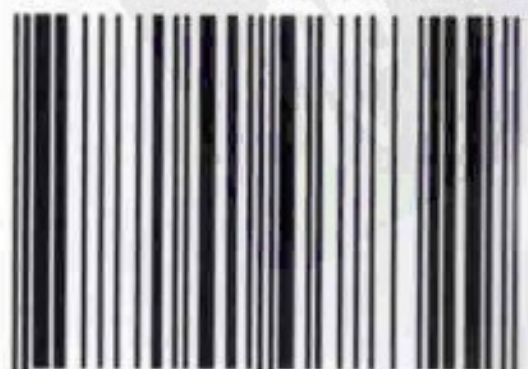
高尚榘 主编



论语歧解辑录

自汉代至今，《论语》研究可谓名家辈出、精彩纷呈，原典疏证和经典解读类著作不断涌现。为使读者能够更加充分利用这些已有材料来理解《论语》之“微言大义”、解读孔子之思想，本书专事汇辑历代歧解材料，举证各家之说，比较互参，对我们研读《论语》很有帮助。

ISBN 978-7-101-07832-9



9 787101 078329 >

定价：140.00元（全二册）

论语歧解辑录

上

高尚榘 主编



论语歧解辑录

下

高尚榘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歧解辑录 / 高尚桀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101 - 07832 - 9

I. 论… II. 高… III. ①儒家②论语 — 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14980 号

书 名	论语歧解辑录(全二册)
主 编	高尚桀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石 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20×980 毫米 1/16 印张 67½ 插页 4 字数 109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832 - 9
定 价	140.00 元

论语歧解辑录编委

主 编 高尚桀

副主编 张诒三 杨秀娟

歧解编辑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建东	王慧敏	方凤丽	刘秀华	刘育林
朱 倩	孙敬友	宋红霞	宋 敏	郑子慧
赵永泉	高 敏	高 霞	夏秀丽	董 敏

索引编制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丽杰 赵 玉

校 对 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 艳 陈 艳 范文洁 曹宇飞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新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06年6月

序 言

《论语歧解辑录》的编纂始自2006年6月,2008年5月书稿基本成形后,我们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2008年10月获得批准。评审专家在肯定选题、内容、价值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修改意见。遵照意见,我们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做了认真的增删修改,现已完稿,呈奉给专家与广大读者,祈正之。

一、《论语》是一部不朽的书

《论语》是辑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语录体著作,是反映孔子思想的基本文献。此书从部头上来讲虽然只有15000余字,但体大思精,精辟地阐述了人生的哲理,合理地规范了人生的准则,受到古今中外学人的普遍关注、尊崇和研究,尤其是当今的“《论语》热”,进一步证明了这部经典的伟大和不朽。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内涵是善待别人,是“爱人”(“仁者爱人”)、爱广大民众(“泛爱众而亲仁”)。这种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时时事事体现在行动上,是要终生去实践它。在“仁”的思想基础上,《论语》中提出了人生诸多方面的要求:

在人生志向方面,《论语》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在道德修养方面,《论语》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

在待人处事方面,《论语》指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子张》)

在教学求知方面,《论语》提出“有教无类”(《卫灵公》)、“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温故知新”、“举一反三”、“择善而从”等主张。

在从政为官方面,《论语》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民无信不立。”(《颜渊》)

在孝道方面,《论语》指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论语》中的语言是精辟的,谈的大都是人生常理,大都是“做人”的道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人人遵奉之,实践之,天下还会有恶行吗?天下还会有战争吗?天下将会是多么和谐美好!

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前言”中如是说:“我至今以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不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以它作为做官求仕的入学初阶或必修课本,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而且通过各种层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撰写编纂的《孝经》、《急就篇》(少数词句)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以及各种‘功过格’等等,当然更包括各种‘家规’‘族训’‘乡约’‘里范’等等法规、条例,使儒学(又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的好些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下,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皇帝宰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所以,它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联,并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尽管其间有差异、距离甚至对立,但并不是巨大鸿沟。这样,儒学和孔子的《论语》倒有些像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一书了。”并曾说:“怎样安身立命?怎样为人处世?中国没有《圣经》,大家就都到《论语》中去找了。”这样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

《论语》不仅被中国学者誉为“两千多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最伟大的书”(汤一介语,见雷原编著《论语:中国人的圣经》),而且被外国人尊为“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日·金谷治《孔子学说在日本的传播》)。

《论语》中虽也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人生精论,将永远影响着人类社会。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演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应该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吾常这样说:“只要有人类,孔子的思想就不会过时。”也就是说,记载孔子思想言行的《论语》,有着永久的生命力,是不朽的。

由于这部经典的伟大和不朽,所以历代学习、解读者众多,其注解著作难以枚举。但由于版本间文字内容的差异、人们理解的差异、政治及学术风气影响等原因,这些著作在《论语》具体语句的解释方面存有较大的分歧,给人们的研读造成了混乱。

二、《论语》歧解的严重情况

历代解读《论语》者甚多,有的客观,有的只凭主观,有的出于政治目的,有的受学派学风的影响,各自以自己的理解,定然会把个《论语》解释得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以《论语》的首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而言,有的版本为“有朋”,有的版本为“友朋”。关于“朋”字,汉包咸解为“同门曰朋”(邢昺《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解为“同类”;清宋翔凤《朴学斋札记》认为朋指“弟子”;清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解为“朋党”;杨伯峻《论语译注》解为“志同道合之人”;金良年《论语译注》解为“具有共同见解的人”;但更多的人将其解为“朋友”。关于“远方”,其义如此明显,然也有歧解:俞樾《群经平议》将“方”解为“并”,曰:“友朋自远方来,犹云友朋自远并来。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并来。”

再如《学而》篇的“贤贤易色”一语,汉孔安国解为“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邢昺《论语注疏》);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解为“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唐颜师古解为“易色,轻略于色,不贵之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宋邢昺《论语注疏》解为“‘贤贤易色’者,上‘贤’,谓好尚之也。下‘贤’,谓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悦之,故经传之文通谓女人为色。人多好色不好贤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则善矣,故曰‘贤贤易色’也”;清王念孙《广雅疏证》解为“‘易’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也”;杨伯峻《论

语译注》解为“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黄怀信《论语新校释》认为“贤贤,当作‘见贤’,以音误。见到贤者而改变其容色”。

又如《述而》篇的“自行束脩以上”一语,汉郑玄解为“年十五以上也”(袁钧《论语郑玄注》);唐李贤《后汉书·延笃传》注“束脩谓束带修饰”;唐韩愈《论语笔解》解为“吾谓以束修为束羞则然矣”;宋邢昺《论语注疏》案“书传言束脩者多矣,皆谓十脰脯也”;南怀瑾《论语别裁》认为“所谓自行束修,就是自行检点约束的意思”;杨佐仁《论束修》认为“束脩是束发修饰之意”;王熙元《论语通释》认为“‘自’字当自从讲,而不作自己讲……‘行’字用作他动词,有实践、做到的意思”;黄怀信《论语新校释》解“自”为“自愿”,“行”为“来送”,“脩”为“长条肉,俗称礼条”,束脩即“一根礼条”;方骥龄《论语新诠》认为“自行”“当作特立独行自动努力向上解,非取十脰干肉上于孔子也”;韩嘉祥《“束修”不是学费》认为“‘行’字作‘可以’讲”;郭海文《论语新诂二则》认为“‘上’,是方位名词活用为动词,向上之意。‘自’,不是介词,而作副词,亲自意。(意译)只要亲自致送十条干肉来求上进,我没有不对他们教诲的”;杨润根《发现论语》认为“‘上’这个字在这里既具有名词的含意,意为至高无上的东西——道德、正义、仁爱等,又具有动词的含意,意为对至高无上的东西——道德、正义、仁爱——的崇尚……自行束脩以上:情不自禁地要穿好礼服、系好鞋带、刮净胡须、洁净身体,以对之表示崇敬或顶礼膜拜的至高无上的真理”;林觥顺《论语我读》认为“束脩,应该是一束芒薪柴祭取血膏裡祀升香,祭天神地社人鬼。是知束脩也是缚治一犬为礼……自行束脩以上,是自行束脩礼仪以祝告在天古圣先王之后,是为拜师入门弟子,有师徒之分。古礼师徒如父子。后人释束脩作学费,荒谬”。

由一斑可窥全豹。一部严肃的儒家经典,被严重的歧解迷乱得是非难断、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它文本真义的正确传播。

三、《论语》产生歧解的原因

汉代以来,注解《论语》者不胜枚举,其注解中存在歧异的严重情况,通过上述已经了然。那么,产生歧解的原因何在?经考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就主观原因而言,是人们理解上的差异;就客观原因而言,是版本不同、错简以及特殊的语录体式所使然。

(一) 版本差异致歧

版本是古籍注疏的依据,版本的不同是造成注解歧异的最根本原因,

因此,要研究《论语》歧解问题,首先必须梳理《论语》版本源流。《论语》在战国前期就已经成书,但是期间经历了秦火焚书,诸多儒家典籍毁之殆尽,直到汉代才有其版本流传的记载。西汉时期,《论语》有三种流传较广的版本,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叙》引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合壁所得,谓之《古论》。”《鲁论》、《齐论》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今文传本,流传颇盛,而《古论》则是景帝末或武帝初鲁恭王刘余坏孔宅壁所得,用战国时代文字写成,属于古文系统。综合相关记载可知,《鲁论》20篇,与现行《论语》编次相同;《齐论》22篇,比《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其他20篇章句内容也与《鲁论》多有不同;《古论》21篇,编次与《鲁论》、《齐论》皆不相同,无《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比《鲁论》多一篇,而这一篇是将《尧曰》“子张问”以下半篇别为一篇,名之曰《从政》。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叙》评《古论》曰:“内倒错不可具说。”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将《鲁》、《齐》、《古》三论作一番考订,删去《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从《鲁论》20篇为定,名之曰《张侯论》,因张禹位高望重,以致当时人人念《张论》,自此以后,三《论》渐被淹没。东汉末年,大儒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又对《论语》进行了一番改订。一般认为,郑玄的这次改订本即是现行《论语》的来源,以后历代学者注释所依版本基本是此次的改订本。

三《论》原貌,我们已难得其详,但根据其他古书的征引、出土材料和后人辑佚本,仍然可以窥得三个版本文字章句的差别,而且郑注本《论语》也与今本有些微差异,即使在《论语》定型以后,也会出现因传抄之误、窜注入经或避讳改字等各种原因产生版本差异,从而造成注解歧异。兹撷取数例,列于下:

《学而》:郑本:“有酒,食先生馐。”今本:“有酒食先生馐。”食余曰馐,饮食曰馐,二字义有别且字不同,而致断句有别。

《述而》:“加吾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经典释文》:“《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古论》、《鲁论》“易”“亦”字有别,则意义迥异。

《微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滔滔,梁章钜《论语旁证》引洪颐煊曰:“滔滔当作悒悒,《鲁论》作悒悒,《古论》作悠悠。”应以“滔滔”为是。“滔滔”有弥漫义,如滔天即漫天,形容满天下世道混乱,颇为恰切。

新出土的《论语》古本,文字上与今本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因而形成歧解。1973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发现了《论语》残简,许多专家进

行了整理研究,并对其做了版本性质的考辨,有学者推测它是“《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学勤《定县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有学者判定“此本当保留了古文《论语》的一些面貌”(孙钦善《四部要集注疏丛刊本〈论语〉前言》,中华书局1988年版),有学者考证此本“是西汉宣帝五凤四年之前的一个重要的《鲁论》抄本”(单承彬《定州汉墓简本〈论语〉性质考辨》,《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还有学者认为“竹简《论语》已经超出了传统已知汉代三《论》的范围,属于汉初今文隶书《论语》”(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定州简本《论语》到底属于哪个版本系统,我们暂且搁置,但它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西汉《论语》原件确是毋庸置疑的。下面举例说明简本与今本在文字上的差异:

简本:《为政》:“功乎异端,斯害也已。”功,今本作“攻”。攻,本有歧义,一曰攻击、批判,一曰治学。功,通常释为“用功于”,可为“治学”之证。

简本:《里仁》:“[君子于天下],无谿也,无莫也。”谿,今本作“適”,郑本作“敵”。无適、无莫,历来多有歧解,郑玄以“適”为“敵”,以“莫”为“慕”,解为“无所为仇,无所欣羨”(袁钧《论语郑玄注》);范宁曰“適莫,犹厚薄也……君子与人无有偏颇厚薄,唯仁义是亲”(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韩愈以为“无適,无可也,无莫,无不可也”(韩愈《论语笔解》);朱熹释为“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莫,不冑也。比,从也”(朱熹《论语集注》)。

简本:《里仁》:“君子踰于义,小人踰于利。”踰,今本作“喻”。踰,同今字“逾”,有“超越”义;喻,有“知晓”义。二字意义差别甚巨。

简本:《公冶长》:“道不行,乘泡浮于海。”泡,今本作“桴”,“泡”字在此句中讲不通。古书桴、枹相同,而枹、泡字形相近,疑“泡”为“枹”之误。

简本:《雍也》:“不有祝鮀之仁。”仁,今本作“佞”。仁,讷言敏行,有德之谓;佞,巧言善辞,无德之谓,二字义正相反。

简本:《述而》:“……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今本:“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简本与《鲁论》同,连下句读为“亦可以毋大过矣”;亦,今本作“易”,连上句读为“五十以学《易》”。二字之不同,导致句读不同、句意迥异。

简本:《先进》:“亡状者乎?”今本为“色庄者乎”。杨伯峻据今本译作“神情上伪装庄重的人”;黄怀信据简本译作“品行恶劣的小人”。

简本:《微子》:“三人焉。”今本作“殷有三仁焉”。“三人”与“三仁”句意差别较大。

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今本《论语》的比较来看,《论语》从西汉流

传至今天,版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字句多有出入,其间不乏汉代因口耳相传误抄而致谬者,但同样也能得知因后世传本的窜改而失其本旨。

(二) 错简倒文致歧

《论语》在其早期的流传过程中,难保没有错简现象,以致此章语句窜入彼章,或者传抄错误,导致上下句文词倒换,这样就会造成文句意义不通或逻辑不连贯,给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若强为之说,则会使歧解谬误流传。后世不少学风严谨的学者在校勘或注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例如:

《颜渊》“子张问崇德辨惑”章“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句,乃出自《诗经·小雅》,皇侃《疏》、刘宝楠《正义》皆解为与上文“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等合为一章,言爱恶无常,不可以致富;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此句引在此处很难解释,宋代程颐说此句当为别章文句,错简误入此处。但该为哪章文句呢?朱熹《论语集注》引程氏说:“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体察文势,若将此句置于该章的“民到于今称之”和“其斯之谓与”之间,则前无赘辞,后无缺漏,密合无间,更为恰当。程颐错简之说,对后世理解颇有启发。李泽厚《论语今读》依循之。

《卫灵公》“史之阙文”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据《汉书·艺文志》引文,认为错衍“有马者借人乘之”七字。今人黄怀信《论语新校释》已将这七字删去。如保留这七字,则很难寻绎出它与上句“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何联系,难免造成多种不同的曲解。

《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清代俞樾最早发现上文“寡”和下文“贫”乃是倒文,应该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和“均”是从财富着眼的,此章下文有“均无贫”可以为证;“寡”和“安”是从人民着眼的,此章下文“和无寡”可以为证(见俞樾《论语平议》)。

《子张》“学而优则仕”章,定州简本《论语》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今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样的颠倒虽不影响语句的基本意义,但总感觉不如简本符合事理逻辑。

(三) 辑录体例致歧

《论语》是辑录而成的语录体著作,言辞简约,意蕴深远,寥寥数言即为一章,话语简约跳跃,上下文语境极为有限,言谈背景交待不详或浑然略去,这种语录体例便为注释者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歧解因而产生。

如《为政》“孟武伯问孝”章的“父母惟其疾之忧”句,学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说,一曰父母忧子之疾,汉代马融最早为此说:“言孝子不妄为非,

唯疾病然后使父母忧。”（何晏《论语集解》）皇侃、邢昺、朱熹等皆秉承此说；一曰子忧父母之疾，汉代王充最早用此义，《论衡·问孔》：“武伯善忧父母，故曰惟其疾之忧。”《淮南子·说林》“忧父之疾者子，治之者医”，高诱注云：“《论语》曰：‘父母惟其疾之忧。’”高氏亦用此义。究竟哪一种为正解？仅从文字层面是难以判断的。陈如勋先生《论语异解辨正》指出“唯父母忧子之疾是慈道，而非孝道”，理虽如此，然仍觉立据不足，而廖焕超先生《〈论语〉考辨一则》（《孔子研究》1991年第4期）关于此章言谈背景的一番考辨则更具说服力：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初，孟孺子泄将圉马于成。成宰公孙宿不受，曰：“孟孙为成之病，不圉马焉。”孺子怒，袭成。从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丧，弗内。袒免哭于。听共，弗许。惧，不归。

……孟孺子泄，即孟武伯。在孟懿子卧病期间，由孟武伯摄理孟孙氏的家务。孟武伯利用了这个权利，擅自决定要在成邑养马，并且进而擅自袭击成邑，鞭打成邑的使者。对这些举动，孟懿子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责备孟武伯不孝。孟武伯不服气……在这个时期，孟武伯向孔子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孔子答了一句“父母惟其疾之忧”。语意中含有教诲和责备之意。意思是说，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不该惹你爸爸生气，因为他正在病中；作为孝子，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疾病。

如果说对“父母惟其疾之忧”的理解还可以通过史籍的记载去获得历史语境，进而帮助我们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对《论语》其他一些语录的语境推定，则会产生诸多歧解，难以断定其语意指向。例如，《八佾》篇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不如媚于灶，何谓也？”孔安国曰：“王孙贾，卫大夫。奥，内也，以喻近臣；灶，以喻执政。贾，执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动之也。”（何晏《论语集解》）此以王孙贾为卫之权臣，其“奥灶之喻”是为了点悟孔子，使孔子求昵于他。晋代栾肇的看法则是“奥尊而无事，灶卑而有求，时周室衰弱，权在诸侯，贾自周出仕卫，故托世俗言以自解于孔子”（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王孙贾是周灵王之孙，乃周室贵胄，栾肇所解，言王孙贾虽为周室贵胄却下事诸侯的忧懣，意在讽“周室衰弱，权在诸侯”，与孔氏所解大不相同。到了清代，周柄中、任启运又有新说，周氏《四书典故辨正》认为：“奥灶之讽，殆指南子而言也。……奥者，室中深隐之地，以比南子；灶是明处，盖谓借援于宫闱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耳。”任氏《四书约